

都市创造传奇

——张爱玲文学场域研究

文 / 李晓红

“场域”是法国布迪厄提出的一个范畴。它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它展示的是由不同的资本和权力所决定的处于不民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艺术场域也是如此。对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产生的研究只有进入其特定的场域才可能对其进行丰富的和立体的把握。我们也必须把“张爱玲传奇”置于关系复杂的“场域”中进行分析，才会发现“传奇”的诞生并非偶然，它与当时上海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背景和文化情景以及张爱玲成长的背景密切相关。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象，期待文艺园地里会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故事，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实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

展。其二，它是指人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样的发展不仅以避免人的某一方面的孤立片面的发展而导致的人性的分裂，比如一个身体强壮的人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或者一个知识丰富的人却是体弱多病、弱不禁风或者道德败坏、品行不端，而且可以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就能够使得社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其三，它是指人的本质力量超越了直接功利目的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是在于提高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素质，而不在于培养他们的谋生手段，所以它就可以使整个社会的公民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那么，这样的小康社会的建成就有了人的素质的保证，同时也就能够保证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其四，它是指感美教育、立美教育、创美教育的协调发展。这样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就使得每个个体的感受美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和提高，使得每个人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趣味正确、健康地建立了起来，同时使得每个人的创造美的能力和水平大大地提高，成为一个具有优美心灵的人、一个具有完整人性的人，一个具有无穷的创造美的世界能力的人，那么就可以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和进一步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人才的需求。总之，审美教育可以保证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那同时就是保证了所有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样就是保证了小康社会的建设，也就是保证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保证着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建设。

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

1944年，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傅雷用“奇迹”来表达他对于“张爱玲传奇”诞生的惊讶。自“张爱玲传奇”现象出现起，就不断有研究者希望为它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其中最有影响的说法莫过于著名作家、当年刊载傅雷文章的杂志《万象》的编者柯灵先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写的一段话：

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即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削减了文学领地。……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

注释：

张玉能.美学要义.第八章.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6年第2版.

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4页
参见曹孚.外国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朱狄.美学问题.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西方美育小史》载该论文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504页

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9:370-372页

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四卷.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361页

徐宗文.“小康”略考.北京:光明日报,2003年5月27日,B3版,理论周刊,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页

作者简介:张玉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美学会理事,湖北美学会副会长。

编辑:豫民

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

柯灵先生的这段话对诞生张爱玲文学传奇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与概括,然而限于篇幅,柯灵先生未能展开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文学情境的详细描述并予以具体分析,特别是对当时上海文学环境的分析,因此,把张爱玲文学传奇的发生只归于上海的沦陷,归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笔者认为多少有些失之简单。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布迪厄曾经批评道:“所有那些忙于对文学或艺术作品进行科学性研究的人,总是忽略了对这样一种社会空间的思考,即创作了这些作品及创造了其价值的那些人所处的社会空间。”他认为,如果仅仅把这个社会空间理解为“社会环境”或“语境”或“社会背景”等等,也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必须进入研究对象所处的“场域”才可能获得一个比较客观的解释。“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场域”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它展示的是由不同的资本和权力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布迪厄把文学制作和文学接受划在“文学场域”之中,个体(作者、文学代理人、评论家等等)和其他机构(出版社、书店、文学界等等)是“文学场域”的主要活动者,同时“文学场域”涉及权力(例如,发表或拒绝出版的权力);它也涉及资本,……权力关系、策略、利益等等”。布迪厄认为,行动者是资本的载体,各种资本的相互作用自然决定了他们在场域中所处的特定位置。“文化生产场在权力场中占据的是一个被统治的地位:……艺术家和作家,或更笼统地说,知识分子其实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他们拥有权力,并且由于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大到足以对文化资本施加权力,就这方面而言,他们具有统治性;但作家和艺术家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又是被统治者。”因此必须重视对掌握文学艺术资源者的分析,因为在一个场域中起作用的不仅经济资本,更重要的是无形的资本(审美价值观、知名度等等),二者必须并重,这是因为一方面能与其他“自治”的场域(文学场域、知识场域、政治场域等等)互相并立的文学场域又是整个社会权力场域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文学场域深受自治即文学的和不自治即非文学的影响。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任何领域的场域都有着其自身的特点,艺术场域也是如此,而对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诞生只有进入其特定的场域才可能对其有着丰富和立体的把握。

笔者认为,对于“张爱玲传奇”现象,当我们把它置于一个关系复杂的“场域”中进行分析时,才会发现“传奇”的诞生并非偶然,它固然与当时上海特殊的历史时期相关联,但同时还与张爱玲成长的背景以及当时上海特殊的政治背景所引致的特殊的文化情境密切相关。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张爱玲文学场域以找寻“张爱玲传奇”现象诞生的更客观的解释。

上海,现代都市的文化传奇

1920年,张爱玲在上海出生,虽然其间她离开过上海,但

是上海这个城市对她的命运最终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如同张爱玲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传奇”,而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也同样是一个传奇。上海从近代开埠以来,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在短短的数十年内,从东海之隅的一座偏僻小城,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具近代化规模的第一大都市,其发展速度令人震惊,堪称近代城市的“传奇”。然而,上海文学的发展速度要比城市的发展速度更为迅猛,更具有传奇色彩。“早在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近代化都市的20多年前,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学城市、全国的文学中心。在19世纪向20世纪的交替期内,上海的文学一下子出现了飞跃性进展。根据粗略的统计:上海出版的近代文学期刊,要占全国总数的83.3%,上海在晚清出版的创作小说,至少占全国总数的61.6%,同期上海出版的翻译小说,至少占全国总数的84.7%。……近代上海文学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从明清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一个本来在中国文学史毫无地位的偏僻小城,既无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甚至在近代也未曾产生著名的上海籍作家,居然一下子便成为指引全国文学发展方向,领导全国文学发展的中心。”中国近代质量较高、社会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包括《新小说》(诞生于日本东京,次年迁到上海)、《小说林》、《绣像小说》和《小说大观》等晚清著名的四大期刊大部分都在上海出版。近代报纸开辟文艺副刊,恐怕也是上海报纸首创,到近代后期《申报》副刊《自由谈》、《新闻报》副刊《余兴》,还有《民权报》副刊,都是著名的大报文艺副刊,颇有社会影响。无论就订户还是就质量而论,上海报纸的文艺副刊都在全国占据了重要地位。晚清还有一支小报队伍,它们基本上是文学性的,阿英《晚清小报录》中历数了27种,这27种文学性小报,也都是上海出版的。清末的《海上花列传》、四大谴责小说及《文明小史》、《碎琴楼》等,以及民国初年质量较高、社会影响较大的小说,如《广陵潮》、《断鸿零雁记》、《玉梨魂》、《孽冤镜》、《雪鸿泪史》、《补过》等等,也都出版于上海。

上海文学传奇的产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上海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外来的西方文明影响、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意识、新型的市民意识等等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媒体的急速增加,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意味着需要一大批作者队伍提供稿源,而众多的媒体出现后,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使得稿费制度逐渐建立起来。近代上海的媒体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最为发达,稿费制度的逐步实行也吸引着大批读书人居住在上海。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对于读书人来说固然是从那种皓首穷经的痛苦生活中解脱出来,但是向上晋升的阶梯也由此阻隔,耕读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能跟得上时代的变迁,他们的生计发生着问题,而此时的中国只有上海能提供这些读书人卖文为生的环境,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近代小说都诞生于上海。现代媒体的诞生也培养了大批的市民读者,而读者的阅读需求也使得作者有创作的动力。

进入20世纪,上海逐渐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更被西方人描绘成冒险家的乐园。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上海从她开埠起,就一直处在多种文学的冲撞与互渗之中,不仅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也有沿海都市文化与内地传统文化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的结果,使上海变得更为开放、更为包容,使得上海成为一个有着无数可能性的城市。这种包容性在当时的政治生态日益严酷的情形下益发显示出其吸引力,因此,这个城市,不仅成

为前朝遗老遗少们度过余生的庇护所,也成为五四落后对政府愈加失望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栖身地。同时,这个城市的文学形态由于来自于不同地域的各种新的力量的加入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除了老派的文人、文学期刊继续吸引着其长期培养起来的市民读者,在这样的氛围中年轻的本土作家急速成长,而许多五四文化名人也纷纷从北京南下到上海定居,使上海文学在传统的商业和市民气息中增添了厚重的文化色彩和尖锐的精英气质。左翼文学的“革命+爱情”模式的充满着罗曼蒂克色彩的作品吸引着青年读者。30年代的海,已经集结了鲁迅、胡适、茅盾、林语堂、沈从文、丁玲、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等等优秀作家。而随着影响力颇大的《小说月报》南迁到上海,《现代》、《良友》、《论语》、《西风》、《人间世》、《宇宙风》等期刊的相继创办也使得上海的文坛更加热闹。众多刊物的存在使写作成为时尚,阅读也成为市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尤其对作家们来说,靠稿费维生基本上成为可能。对于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上海相对于其它的中国城市,更是有着无数的可能性。正是如此,才有40年代靠卖文为生的张爱玲的出现。

因此,上海这个本身就是近代中国历史和文学传奇的都市,成为“张爱玲传奇”诞生的最重要的背景。

沦陷区期刊的“传奇”现象

1937年11月,上海周边地区都被日本人占领,上海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孤岛”时期。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上海沦陷。在日伪政府统治下,上海的政治生态变得急剧恶化,物质极为匮乏,经济极其萧条。《杂志》曾经组织包括张爱玲在内的当时上海知名作家们讨论“我们该写什么”,其中的作者之一钱公侠所说的一段话也许最能代表生活在沦陷时期上海的人们的心声: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真是苦闷之至的时代了。或者如狄更斯所著《双城记》首节所云,“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之世,这是愚昧之世,这是信仰之年,这是怀疑之年,这是光明之季,这是黑暗之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有无限的前途,我们已山穷水尽,我们行将直上天堂,我们正在直坠地狱——总之,这时代正像现在一样,有几位声闻卓著的权威作家,都坚称我们不论将它看作是善是恶,都须用修辞学中最高级的字眼去形容它。”拿这一段来描写我们处处的这个乱世,可谓再恰当也没有。

1942年末、1943年初,情形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抗战结束之后曾有作者著文对沦陷后的上海文坛予以详述:

打了八年仗,沦陷区的文坛,在后几年中,也还不寂寞。我说不寂寞,是指作品中有着较正确的意识形态的,并非指充斥市场的那些桃色黄色以及冒出卖国气味的刊物。相反,那时所流行的这类东西,似乎还不及现在的多。这是良心话。

所谓不寂寞的文坛,重心在上海。北方是颇乏精彩的。即使是周作人这样的人物,到了后来,他的文章也都是在南方的刊物上发表,北方只是受到一点的影响而已。当然,有些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还应属于“好”的一面,说得清楚些,即是与大后方抗战的大前提并不相悖而实相成。大江南北的青年之所以还有一点活气,这方面的力量大约不能否认。这笔陈帐如果要算,原不不无可算之处;不过现在的人们懒得算它,而且也有点怕算罢了。

上海文坛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这时又开始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心,当然,与过去相比现在则是个尴尬的中心,因为有民族节气

的作家们早已离开上海或封笔不写了,许多文学刊物不肯点缀日伪控制下的文坛而迁移内地,因此,这次上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实在是有些吊诡的意味。尴尬是事实,然而给人们的惊喜也是有的,虽然此时的文坛与战争前的繁荣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生活在那个阶段的很多人却都感受到了上海文坛一种奇异的空气:

去年的黄梅,海绵体的世界,人在这样的日子里,是爬行的;乏得像一条蜒蚰。然而你若给他一秒钟的注视,又发现他在动,同时也有了路,没精打采的、贫血的路。

就在这些日子里,上海的文坛又在几种期刊上出现了,来势确有点俨然……虽然如此,却也耳目一新。南通市上,就陆续来了《古今》、《杂志》、《风雨谈》、《万象》、《天地》。作风多数是整过形的、南方儒生惰性的表现,群居整日、言不及义的劲儿。

《万岁》杂志第2卷第1期(1943年5月1日出版)的“万岁信箱”中有一则回答读者许国桢来信也证实了上述的说法:“市上较有价值之刊物,有《杂志》、《古今》、《万象》、《风雨谈》、《小说月报》等”。可见这些杂志广为读者和同仁所关注。当时的上海除上述有份量的杂志外,在市民中有较大影响的杂志还有《紫罗兰》、《大家》、《万岁》、《春秋》等。当然,各杂志的定位与风格还是有所不同的,《紫罗兰》、《杂志》、《万象》、《小说月报》、《大家》等期刊文学色彩比较浓厚,《天地》、《古今》、《风雨谈》、《万岁》等偏重文化色彩,而《千秋》等杂志则主要是以娱乐为主。这些刊物多只用简短的内容论及时事,却非常重视文学创作,重视介绍上海的文化活动。

这些文学期刊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涉政治。从刊物的角度来讲,不涉政治可以与日伪政府保持距离,同时可以进行纯艺术的探讨(当然,在那个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的时代,谈艺术是有点痛苦的);对于日本人来说,只要有期刊发行,可以使人气凋零的沦陷区文坛保持点温度,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按照布迪厄的理论,“场域”所展示的是由不同的资本和权力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掌控此时上海文学“场域”的“资本”和“权力”在有意无意之间都对政治、意识形态疏离,这也许就是柯灵先生讲的“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的原因吧。因此,讨论“张爱玲传奇”现象的诞生,这个特定的文学场域的内涵是首先应该被分析的。

张爱玲因为生计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卖文为生。一开始她主要是为一些英文报刊如《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写文章,到1943年,上海的一些中文杂志的创刊或复刊,使张爱玲卖文多了一些出路,于是1943年成为期待能够卖文为生的张爱玲最佳的契机,而张爱玲也的确把握住了这个时机,甚至使1943年成为“张爱玲年”。

张爱玲当时发表中文作品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份:《紫罗兰》、《古今》、《天地》、《杂志》、《万象》、《风雨谈》、《苦竹》等等。在日伪统治期间,这些刊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办刊方针,就是不过多谈及时政。除《杂志》有一个“一月风雨”以简单介绍时政的栏目外,其余的刊物几乎都打出“不谈国事”的招牌,再加上很多进步文人都封笔不愿点缀日伪文坛或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了,那么,支撑这个时期大量期刊稿件的作者又是哪些人呢?笔者通过分析其中寿命比较长的几份刊物的作者群,发现当时上

海期刊的作者除了不多的几位新文学作家外 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作者组成:

第一 被五四新文学阵营一直批判的、喜欢写言情和武侠小说的所谓旧派文人是一个最庞大的作者群体 如朱瘦菊、程小青、周瘦鹃、徐卓呆、程瞻庐、郑逸梅、秦瘦鸥、顾明道、范烟桥、陈蝶衣、张恨水等等 这些曾经在20世纪初期文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作家们 经过二、三十年代的沉寂后又频繁地出现在上海文坛。

第二,三、四十年代出现在上海文坛的年青作家们 如张爱玲、施济美、汤雪华、予且、丁谛、周楞伽(危月燕)、苏青、李君维、谭正璧、丁谛、谭惟翰、陶亢德等等,这也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体。

第三,身份比较特殊的一些文人 他们包括周佛海、周作人、陈公博(时任上海伪市长)、朱朴(上海伪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胡兰成等等。

毫无疑问 第一和第二部分的人群组成了沦陷区时期上海最主要的作者群落 但是 第三部分的人群则是上海文学场域的资本持有人 他们或是一些期刊资金的主要提供者 或是一些期刊的社长 他们无疑对这个场域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们虽然在伪政府中任职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们仍然希望在文学中找到安慰。如《古今》的社长朱朴,由于爱子“殇亡”,“因中心哀痛,不能自己 遂决定试办这一个小小刊物 想勉强作为精神的排遣。不料出版以后 洛阳纸贵 口碑载道 我一面既庆幸新宠之前途无量,一面却又深感旧恨的永难忘怀 俯仰身世 诚不胜酸甜苦辣之感!” 这大约也是这类刊物不太涉政治的因素之一。

这些刊物因主编的不同 所延请的作者不同 因而 内容、风格上有一些差异。其中以平和冲淡的格调 以文史掌故、人情世态、婚姻家庭为打内容的期刊最多。这与当时沦陷区的政治生态有极大的关系。谭惟翰在回答《杂志》“我们该写什么”(8月号,第13卷第5期,1944年8月10日出版,复刊第25号)这样回答道:

写什么?

描写社会的黑暗方面,说是“暴露明显”,要不得!那么,就是讽刺的一条路吧,可是有人疑神疑鬼,以为你是故意骂他的,要同你交涉。索性“制造”一些曲折离奇的故事如何?人家说近乎传奇,称不起是创作。实在写不出什么,只好“怀旧”一番,把些故人往事都提出来,但又免不了伤感的成份。倒不如说几句慷慨激昂的话来得动听 不过又甘心这些话在纸上都变成了××××××,有些甚至连×都没有,甘脆的将文句拦腰剃去一部分,叫你自己读来都摸不着头脑。……

因此 日本人统治之下严苛的检查制度使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传统被中断,于是平和冲淡之风盛行,人生趣味文字风靡。但是也许让文学又回到文学本身 那种“把文学当做宣传工具”的做法也没办法实行了。郑秉珊在其《<古今>一年写作一年》谈到《古今》杂志的风格是承续《语丝》、《论语》、《人间世》、《逸经》、《越风》,尤其象《宇宙风》;“偏重小品 不废文史掌故 因为主编周黎庵、陶亢德便是宇宙风的旧人,”但是《古今》作者的年纪多为中年以上;“其阅读学识处境,都和《宇宙风》的作者不同,因此其作品,显著平淡,沉着,充实诸特点,虽然有人讥为扯淡,又谓并无写情写景纯文学优美的文章。”而谈掌故、谈趣味,自然是朱瘦菊、程小青、周瘦鹃、郑

逸梅、范烟桥等这些旧派文人最拿手的 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当时文章“作风多数是整过形的、南方儒生惰性的表现 群居整日、言不及义的劲儿。”

但是有些期刊还是力求进行纯艺术的研究与探讨 讨论的题目广泛,内容深入。例如发表过张爱玲多篇作品的《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一个主题座谈或笔谈会 邀请当时上海的相关专家或作家参与讨论 话题非常广泛 主要是针对当时上海的一些热门话题展开,比如艺术门类方面,有“秋海棠的演出”特辑(第10卷第5期),包含石挥《秋海棠演出手记之一》、沈敏《谈罗湘绮》、《沈敏访问记》、秦瘦鸥的《我评秋海棠》、《秋海棠及其它》等多篇文章;“崔承喜舞蹈座谈”(第12卷第2期);“国产电影编剧座谈”(第12卷第2期);“平剧艺术座谈”(出席者有周信芳、张君秋等,第12卷第4期);“舞台艺术座谈”(出席者有韩非、石挥、冯喆、张伐等,第12卷第5卷5期)。社会、文化方面则有“出版文化诸问题特辑”(第11卷第5期)“上海的小型报文化”(第11卷第6期)“掌故座谈”(出席者有内山完造、包天笑、周越然、徐卓呆等,第14卷第2期)“音乐座谈会”(第13卷第4期)“男女是非”(推出辜鸿铭的《中国的女人道》、《男人烦恼》以及《关于怪儒辜鸿铭》等文章)等。文学方面则有“新文艺写作问题笔谈特辑”(第11卷第1期、第2期)讨论新文艺写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其中有张爱玲参加的讨论会有“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第14卷第6期、第15卷第1、第2期,该专辑包含有《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等文章)“纳凉会记”(第15卷第5期)“女作家聚谈”(第13卷第1期)“《传奇》集评茶会记”等。

从《杂志》所进行的各种讨论专题来看,虽生存于乱世,但是人们对文学艺术探讨、追求的热情还是相当之高。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 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 却还是有着一群人、一些刊物,打造着纯文学的殿堂,也许是因为环境所迫 然而无论如何 这个特别的时空也许就是为等待着“传奇”的出现而存在。

女性作家集体浮出历史地表

沦陷时期上海的期刊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女性生活、女性情感成为这时期期刊的特点与卖点。女作家、女明星、女教师、家庭主妇、小说中的女主角、女性的生活、女性的情感困惑、女性的职场艰辛……几乎是每一份期刊的主要内容。比如《千秋》所刊载的文章基本上都与女性有关,如《萧红死后——致某作家》、《女演员外传》(对外国剧本的改写)、《歌女》(翻译小说)等等;“新歌星座谈会”、“电影四姊妹座谈”等座谈会的组织 基本上都是以女性读者作为诉求对象。《万岁》也是一份女性色彩比较浓的刊物;“古今·人物”专栏登载了易庵的《记谢冰莹》、司马星的《关于鲁迅妇人》;“我的生活”专栏 所邀请的作者和描写的对象多为当时上海当红的电影、戏剧、戏曲界的女明星,如陈云裳、陈燕燕、孙景路、袁雪芬、周璇、梅熹、王薇等等;“婚姻·家庭”栏目的文章主要是《美的家庭》、《怎样做现代丈夫》、《怎样选择你的配偶》、《择妻须择经济妻》、《谈家庭娱乐》、《合理的住室建筑》、《从订婚到结婚》、《性知识与配偶选择》、《生育指导所》、《怕太太特辑》、《银幕上接吻的研究》等;“妇女读物”栏目则是有关于家庭主妇的读物介绍,如《主妇读本》、《家庭经济支配法》以及《小姐教科书》等;“职业与妇女”则针对当时女性当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职业女性比如小学教师来谈职业女性与情感的矛盾与困惑,如雪茵的《乡村女教师》。此外《好莱坞的没落女星》、《好莱坞的美男子》、《好莱坞的儿戏婚姻》、《好莱坞

的红小生》等有关于好莱坞生活的文章几乎每期都有。

不仅上述以艺文为主打的期刊如此,即使以文学、文化为主打内容的期刊中也出现了大量与女性有关的作品。《紫罗兰》的第九期推出“美与健”专辑,内容涉及女人之美、美容谈屑、发之美、眉的妆饰、耳饰、怎样使你的手白嫩、樱唇美、女性健康美、桃乐丝德丽娃的健身要诀等。编辑还特别指出“本期特辑为‘美与健’,当这万方多难的时代,妇女们所负责的重大,正不在男子之下,似乎不应当再提倡美容。然而爱美是人类的天性,以妇女为尤甚;在这可能范围内,我们正不必滥唱高调,作泯没天性的举动。不过美容不可忘健身,这倒必须大声疾呼,引起妇女们注意的。……身体的健全与否,有关民族前途,所以妇女们非加意研究健身之道不可;……”。谈身体的美在当时虽有些不合时宜,将身体的美与民族前途加以联系也未免牵强,但由此可见编辑的良苦用心。第12期“夫妇之道”则主要有老伉俪之爱、美国男女择偶的标准、怎样选择你的丈夫、妻子的男朋友问题、夫与妻的十大错误、夫妇之爱的技巧等文章。

前述《杂志》曾推出过很多专题,作过很多专题讨论,但是唯有第14卷第6期(1945年3月10日出版)所推出的“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包括的文章有《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女大不嫁》、《葛斯理《女人终是女人》)反响最为热烈。其后的第15卷第1期(1945年4月10日出版)再次推出“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并开辟“特辑之二:读者的反应”一栏;第15卷第2期(1945年5月10日出版)又推出“他们的意见特辑: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专门登载读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见,这个问题所受到关注的程度。而当年在上海滩非常轰动的詹周氏杀夫案《杂志》登载了苏青的《为杀夫者辩》(第15卷第3期)后,又推出关露等撰写的“杀夫案笔谈”(第15卷第4期)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探讨,由此可见女性问题已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不仅女性生活成为各杂志关注的对象,而女性作家的身影也频频出现在《万象》、《紫罗兰》、《杂志》、《天地》、《风雨谈》等这些重量级的刊物上,几乎每份杂志都有不可忽视的女性作家群。《紫罗兰》杂志上的女作者几乎占了一半,除张爱玲外,还有周令玉(周瘦鹃之女)、孙薇青、施济英、王冰持、王纹黛、汤小珞、蔡炎炎、陈福慧、薛所正、吴频子、戴容、陈元宁等女作家,施济美、汤雪华、练元秀、程育真(程小青之女)等更是长期的撰稿作者,第五期《紫罗兰》甚至几乎成为女作家专号。《紫罗兰》拥有一个庞大的女性作家群体,她与《万象》一起网罗了当时被广泛专注的“东吴女学生”作家群中所有的作者。“东吴女学生”作家群包括施济美、汤雪华、程育真、练元秀、俞昭明、杨琇珍等,由于成名于五四弥洒社时期,当时为东吴大学教授的胡山源先生的极力推荐,这些大多为东吴大学毕业的女学生们的文字得以频频出现在《紫罗兰》、《万象》杂志上,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杂志》除登载了苏青、张爱玲大量的作品外,第13卷第1期(1944年4月10日出版)还专门推出“女作家聚谈”专栏,邀请沪上著名的女性作家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蓝业珍、关露、苏青以及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等一起讨论女性写作的问题。第13卷第2期(1944年5月10日出版)还刊登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关露、苏青等六位女作家的相片以飨读者。

女性作家的大量出现,《天地》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天地》诞生于1943年底,但是由于其主编是苏青,也使得这

份刊物成为女性作者们重要的舞台。她在《天地》创刊号(1943年10月10日出版)《发刊词》中这样写道:

最后,我还要申述一个愿望,便是提倡女子写作,盖写文章以情感为主,而女子最重感情,此其宜于写作理由一;写文章无时间及地点之限制,不妨碍女子的家庭工作,此理由二;写文章最忌虚伪,而女子因社会地位不高,不必多所顾忌,写来自较率真,此理由三;文章乃是笔谈,而女子顶爱道东家长,西家短的,正可在此大谈特谈,此理由四;还有最后也就是最大的一个理由,便是女子的负担较轻,著书非为稻粱谋,因此可以有感便写,无话拉倒,固不必如职业文人般,有勉强为之痛苦也。

苏青鼓励女性作者为《天地》投稿,大力提倡“女子写作”,她自己在《天地》上就发表了《恋爱结婚养儿子的职业化》(第16期)、《再谈离婚》(第23期)、《论红颜薄命》(第26期)、《谈做官》(第29期)等与女性生活有关的文章。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期的上海,女性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和被消费的群体?换言之,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期刊都不约而同地以“女性”为主打内容?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女性作家能够集体浮出历史地表?

伍尔芙在《妇女与小说》一文中也关注过英国曾经存在的相同的现象,即为为什么到了19世纪英国突然出现了四大女作家——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爱略特:

……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之前,没有妇女持续不断地写作?为什么到了十八世纪,她们几乎像男子一般习惯于写作?而且在写作的过程中接二连三地创造了一些英国小说的经典之作?为什么她们的艺术创作在那时候——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依然如此——要采取小说的形式?

……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关于我们的父辈,我们总能知道一些事实、一些特征。他们曾经是士兵或者水手;……但是关于我们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又留下了一些什么印象呢?除了某种传统之外,一无所有。……除了她们的姓名、结婚日期和子女数目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奇怪的、沉默的空白阶段,似乎分隔了历史上各个活跃时期。……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异乎寻常地涌现出大批小说,其先驱征兆,必然是法律、风俗、习惯诸方面无数细小的变化。十九世纪的妇女有了一点闲暇;她们受了一些教育。自己挑选她们中意的丈夫,对于中、上阶层的妇女来说,不再是罕见的例外。而四大女作家——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爱略特——没有一位生育过子女,其中有一位没有结过婚,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伍尔芙认为,19世纪英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细微变化,包括女性生活的变化,才使得英国的女性写作出现了这种奇异的现象。同样,40年代初期上海突然出现大批女性作家也并非偶然,它与当时上海的社会、政治、女性生活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促使这一现象产生:

第一,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日本人统治上海后,大量男性作家内迁,即使留在上海也不愿发表作品,不愿去点缀日伪统治的文坛,在作家缺失的情形下,女性作家得以被关注。同时女性作家的民族意识似乎没有那么强烈,就像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对柯灵建议其“海晏河清”后再将其作品结集出版的建议不以为然。男性作家集体失语之际,女性作家得以集体浮出历史

地表,这一特殊的现象的发生;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第二,与女性写作的题材有关。女性作家所写的题材大都是家庭、情感之类的文字,与时政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使得杂志在刊登这类文章时比较容易通过日本人的检查关。

第三,与各杂志的大力推介女性作者有关。这其中功劳尤其首推周瘦鹃办的《紫罗兰》。作为《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在每期《紫罗兰》都有一个“写在前面的话”,对作者专文介绍。第1期上就提出“要特别介绍两位女作家的作品:施济美女士的《野草》,汤雪华女士的《死灰》,都当得上‘不同凡俗’四个字的考语。”第2期则用两面的篇幅来隆重推介张爱玲。第三期上周瘦鹃还大发感慨:“近来女作家人才辈出,正不输于男作家,她们的一枝妙笔,真会生出一朵朵的花儿来,自大可不必再去描龙绣凤了。就中施济美女士,要算是杰出的一个,教人不能不佩服。”汤雪华女士也是女作家中的一位健将,文笔的老练,描写的生动,老友胡山源兄最为称许,说是在女作家中不可多得的。”在第5期上明确指出“施济美女士和俞昭明女士,是女作家中绛树双声,一时透亮。……”。《紫罗兰》等期刊对女性作者的推介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第四,与职业女性逐渐增多有关。五四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教育并成为职业女性,这种现象在上海尤其如此。上海作为一个国内开放度较高的城市,对女性受教育和女性外出工作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增高,如属于“东吴女学生”作家群的作家们大多毕业于东吴大学,后从事教师、文员等职业,令玉(周玲)和俞昭明是教师,施济美除了为各杂志写作外,还兼任家庭教师,练元秀毕业于大同大学。苏青曾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因结婚怀孕中途退学,她此时一边主编《天地》,一边也为各大报刊杂志撰稿。所以大学没有的毕业的张爱玲在当时靠卖文为生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万象》曾在1944年10月1日出版的杂志上特辟“职业妇女生活”特辑,包括来自教师、舞女、售票员、职员等多种行业的女性写的近十篇文章,但即使如此,编辑还抱怨来稿“所涉及的职业范围也嫌太狭窄”,可见当时上海女性从事的行业已经相当广泛。这些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女性的大量出现,而当时动荡的生活、成问题的生计使得许多女性必须兼顾几种职业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因此,文坛的女性作家增多成为一个毫不奇怪的现象。

在一个商业的社会中,女性往往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而在一个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中,一个新起的群体,女明星、女教师、女职员、女作家都会成为这个社会窥视、津津乐道的对象。因此,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女性作家群体的出现一方面是这个社会心理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女性作家也以自己的写作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而由于上述的原因,女性作家得以集体浮出历史地表,引起文坛的关注。之所以说是“集体”,因为的确是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有这么多的女作家出现,堪称“女性写作传奇”,她们占据着文坛醒目的位置,很多刊物大部分是靠女性作家的作品来支撑的。

因此,在女性作家集体浮出历史地表之际,“张爱玲传奇”的诞生不过是一个很很自然的现象。

四十年代期刊的造星运动——张爱玲

“传奇”出现,总该有“异象”吧?《紫罗兰》杂志成为张爱玲惊艳上海滩的第一份杂志,1943年5月,周瘦鹃在复刊后的《紫罗兰》第2期上浓墨重彩地介绍张爱玲出场:

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正懒洋洋地躺在紫罗兰庵里,不想出门;眼望着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枝紫罗兰香袅起的一缕青烟在出神。我的小女儿瑛忽然急匆匆地赶上三层楼来,拿一个挺大的信封递给我,说有一位张女士来访问。我拆开信一瞧,原来是黄园主任岳渊老人介绍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女士来,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我忙不迭地赶下楼去,却见客厅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的长身玉立的小姐来向我鞠躬,……

虽然周瘦鹃很习惯在每期《紫罗兰》的“写在紫罗兰前头”介绍本期作者、作品,但是为介绍一个几乎过去还没有任何人关注的年青作者,竟花了近两千字的笔墨,这在《紫罗兰》这份老牌杂志也算是很少见的了。而周瘦鹃在文中,不仅指出张爱玲小说兼受《红楼梦》和英国作家毛姆的影响,小说本身取名《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弥漫着上海市民所熟悉的通俗小说的气息,他还对作品之外的很多让读者感兴趣的元素有意无意地有所流露:鹅黄缎的袍子,长身玉立的小姐,黄岳渊老人,《西风》的《天才梦》,曾是大学生,现在则卖文为生,而且卖的是“西”文剧评影评,母亲游学法国学习绘画,本人也擅长绘画,与姑母住在西式的电梯公寓,精致的茶点,精美的茶具……透过这一切,周瘦鹃有意无意之间“包装”出了一位很有才华却可怜无靠,必须靠卖文为生,然而美丽、矜持,有着时尚高雅的品味,有家族背景、有中西文化素养,令人顿生同情与尊敬之心的女性作者的形象。行文中虽也可见通俗作家常有的行文的奢靡,但是周瘦鹃对这位年青作者的才华的欣赏,对她的文字的喜爱,却也完全地流露出来。

《紫罗兰》的大力推介,想必其他杂志都注意到了,从此,张爱玲的文字、绘画、身影频频出现在上海其他各大杂志上。其中《杂志》尤为不遗余力。

1943年7月,《杂志》第11卷第4期推出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不仅文中附有张爱玲画的插图,让读者见识张爱玲的绘画才华,而且目录栏给予最大的字号标出《茉莉香片》(张爱玲作并图)”,短小的编辑后记里还对张爱玲再次强调:“张爱玲女士的小说在本刊还是第一次出现,在《茉莉香片》中,对于一个在腐烂的家庭环境中生长起来的青年的变态心理有深入的刻画,写法也很新显(鲜。笔者注),更难得的,还由张女士自己插画,应向读者推荐。”此后,张爱玲的作品几乎出现在每一期的杂志上,目录栏一定用最大字号突出张爱玲作品的标题,而小说也都请张爱玲亲自画插图;“编辑后记”里还要对张爱玲的作品再次强调。对一个新作家如此之重视在上海期刊中也实在是十分少见的。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最多,除前述《茉莉香片》外,还有《到底是上海人》(第11卷第5期)、《倾城之恋》(第11卷第6期、第12卷第1期,张绘插图)、《金锁记》(第12卷第2期、第3期,张绘插图)、《必也正名乎》(第12卷第4期)、《年青的时候》(第12卷第5期,张绘插图)、《花凋》(第12卷第6期,张绘插图)、《爱》《有女同车》《走!走到楼上去》(第13卷第1期)、《红玫瑰与白玫瑰》(第13卷第2期、第3期、第4期)、《诗与胡说》(第13卷第5期)、《忘不了的画》(第13卷第6期)、《殷宝滢送花楼》(第14卷第2期)、《等》(第14卷第3期)、《留情》(第14卷第5期)、《创世纪》(特约中篇,第14卷第6期、第15卷第1期、第3期、第4期)、《浪子与善女人》(炎樱作,张爱玲译,第15卷第4期),涉及小说、散文、文艺欣赏等各种类型的写作密集发表。

其次《杂志》除让张爱玲为自己的小说画插图外，还约请张爱玲画杂志的扉页。从第13卷第1期（1944年4月10日出版）起《杂志》将一直是上海著名画家画的扉页图改请张爱玲来绘，张爱玲持续画了《三月的风》（第13卷第1期）、《四月的风》（第13卷第2期）、《小暑取景》（第13卷第3期）、《等待着迟到的夏》（第13卷第4期）、《跋扈的夏》（第13卷第5期）、《新秋的贤妻》（第13卷第6期）、《听秋声》（14卷第1期）等多期扉页，更加集中地展示了张爱玲写作之外在绘画上的天才。

再次《杂志》经常组织以张爱玲为主题的活动。如1944年3月16日组织的女作家座谈会，邀请包括张爱玲在内的汪丽玲、吴婴之、潘柳黛、蓝业珍、关露、谭正璧等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研究者在一起讨论当前女性创作的情形，使读者对张爱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会谈记录在《杂志》1944年4月10日出版的第13卷第1期上发表）接着还刊登包括张爱玲在内的共有汪丽玲、吴婴之、潘柳黛、关露、苏青等六位女作家的相片。1944年8月26日，《杂志》在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出版后，马上组织了由谷正、炎樱、柳雨生（书面参加）、南容、哲非、班公（书面参加）、袁昌、陶亢德、尧洛川、实斋、钱公侠、谭正璧、谭惟翰、苏青等庞大的读者、学者、作家、主编等参加的茶会，对《传奇》的再版进行宣传（座谈记录《传奇集评茶会记》发表于1944年9月10日出版的第13卷第6期《杂志》上），对其后《传奇》的几次再版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945年2月27日《杂志》又约请张爱玲与苏青参加以“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为主题的讨论，二位主角的感性却不乏智慧的讨论对这次讨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谈记录发表于1945年3月10日出版的第14卷第6期《杂志》上），也使得读者对张爱玲关于家庭、婚姻的观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45年7月21日，《杂志》再次组织由陈彬和、金雄白、李香兰、张爱玲、松本大尉、川喜多长政、炎樱等参加的以“纵谈影艺文学，评论大小型报纸，兼及生活感想”为主题的茶话会，会谈记录发表于本次复刊的《杂志》的最后一期第15卷第5期上（1945年8月10日）。由此可见，《杂志》通过组织作品评论会、作家对谈会等方式对张爱玲及其作品进行了不遗余力地宣传。

另外《杂志》还就张爱玲对服饰的品味大加宣传。每次只要有张爱玲出场，就必定对张爱玲的服饰趣味进行浓墨重彩地描绘，如“座谈会是在下午三时开始，这次，张爱玲女士穿着橙黄色绸的上装，像《传奇》封面那样蓝颜色的裙子，头发在鬓上卷了一圈，其他便长长地披下来，戴着淡黄色玳瑁边的眼镜，擦着口红，风度是沉静而庄重。”（《〈传奇〉集评茶会记》）……来得最迟的是张爱玲小姐，她的衣服更充满了古典味的彩色感，……张爱玲小姐穿着桃红色的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色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眼镜里的眸子，一如她的人一般沉静。”（《崔承喜二次来沪记》）张爱玲小姐，她颇长的身材，穿的西式衣服，就像她在《流言》里题作《升华》的那张相片的模样，象牙色底子上，稀稀加上几朵紫黑色的花，她的头发长长地披在两肩上，发上插朵天青紫的绒蝴蝶，有着娴静的美。（《纳凉会记》）对张爱玲服饰品味大加赞赏，营造出与张爱玲作品本身一样既古典又现代的气质。张爱玲的服饰趣味因之在沪上造成旋风，有作者说：“我妹妹穿了灰背大衣，穿了一件黄缎子印咖啡色涡漩花的旗袍，戴了副银环子，谁见了就说：‘你也张爱玲似地打扮起来了！’”可见张爱玲在上海的影响从书本走向了现实生活中。

由以上可见《杂志》对张爱玲的宣传包装是全方位的，从作品推介到作品宣传，再到绘画、服饰，张爱玲的名字自从其《茉莉香片》开始，出现在每一期的《杂志》上，直到1945年8月《杂志》停刊为止。因此，如果说《紫罗兰》是发现张爱玲的重要杂志，而《杂志》则对“张爱玲传奇”的诞生起着重要的作用。

除了《紫罗兰》与《杂志》外，上海其他的期刊也对张爱玲的作品非常重视。

1943年8月，《万象》第3年第2期推出张爱玲的小说《心经》，在目录栏特别标明“《心经》（本篇插图，作者自绘）”，卷末的“编辑室”也特地对张爱玲进行介绍：“近年来创作小说质与量的贫乏是一般现象，我们不自量力，颇想在这方面下点耕耘功夫。”《心经》的作者张爱玲女士，在近顷小说作者中颇引人注目，她同时擅长绘事，所以她的文字似乎也有色泽鲜明的特色。”其后还发表了她的《琉璃瓦》（作者自绘插图，1943年11月1日出版，第3年第5期）、《连环套》（长篇连载，第3年第7期、8期、9期、10期、12期，1944年1月-6月出版）。1943年11月，刚创刊的《天地》杂志便在第2期上刊登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其后刊登了张爱玲大量的散文，并且第11期到第14期的封面也是请张爱玲设计，为一少女侧仰头像。《风雨谈》杂志则发表了研究张爱玲的重要文章《说张爱玲》（柳雨生，第15期）、《论苏青及张爱玲》（谭正璧，第16期）等。

还有一个对“张爱玲传奇”起着重要作用的期刊是《古今》。虽然《古今》仅只发表过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第3期）和《更衣记》（第34期）两篇散文，但《古今》由于其风格属于喜谈古今人物、风土人情、怀古感旧，有清谈风之特征，因此《古今》以发掘张爱玲家族故事为己任，对张爱玲的贵族背景津津乐道，使张爱玲本身都不太清楚的家族故事被仔细地挖掘了出来，其中《古今》主编之一周黎庵撰写的《孽海花人物世家》（第37期，1943年12月16日出版）是较早的一篇详述张爱玲家族背景的长文，今摘其部分：

近顷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吾友万象主者平君襟亚掬扬甚力，尝见平君之文见于报章，谓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云云。晚清政局粤人而张姓者，舍张樵野侍郎荫桓无他人，即《孽海花》中庄小燕（焕英），侍郎为清季外交界上特出之人物，出身佐贰，×历八座，虽严谴新疆，卒致祸戮，然其人才学，实出侪辈，盖绍通中西文化，侍郎之力居多。张女士返自天南，又夙攻西学，遂信侍郎继起有人，不知南辕北辙，相去竟不可以道里计也。

既而某小姐介绍张女士来谒，×《古今》以数文，均清丽可诵，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云。余大疑，南海侍郎于《孽海花》中初无恋爱事迹可稽，有之，其唯丰润。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遂告女士以丰润之后，亦即恍然，盖与子闲为同辈孙而异祖母之所出也。

女士求学于香港大学，战后方来沪，其母则与父化离，近方浪迹南洋，不通音讯，女士与姑居于沪，仅恃鬻文自存云。

女士又言，其姑盖即丰润仅存之女，颇悉丰润合肥两家故事，思与能知天宝故事者一谈，亟盼余过其所居。而余尘事鞅掌，竟未一践夙诺，颇为恨事。何日得有清暇，与河间善化诸君同诣，一谈同光清流马尾××故事，岂不人生之一大快乎！

该文不仅对张家逸事津津乐道，对张氏后人作了详细的解

析,对张氏家族又出了一个才女备感欣慰,对张爱玲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挖掘张爱玲贵族背景文章发表的热潮,仅《古今》就连续九期刊载《孽海花闲话(一-九)》(冒鹤亭,第41-50期,1944年2月-7月出版),忏庵的《张佩纶与李鸿章》(第50期,1944年7月1日出版)进一步介绍张佩纶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渊源与背景,纪果庵在《清史世家略记(上)》(第56期,1944年10月1日出版)更详述李鸿章家族:

合肥李氏
大学士吏部尚书文定公李天馥(远祖)
两广总督勤恪公李瀚章(兄)
大学士一等侯总督文忠公李鸿章(弟)
云贵总督李经义(侄)
翰林院侍讲李经畬(瀚章子)
侍郎李经芬(文忠子)
委广州都通世袭一等侯李国杰(文忠氏)
《清史世家略记(下)》(第57期,1944年10月出版)
又详述张佩纶家族:
丰润张氏
安徽按察使张印塘(父)
副都御史张佩纹(子)
两广两江总督张人骏(佩纶侄)
大清银行正监督张允言(人骏子)

这几篇文章使读者对李鸿章、张佩纶的家族谱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外《孽海花人物琐谈》(冒鹤亭,第38期)、《续孽海花人物琐谈》(冒鹤亭,第39期)、《记<孽海花>硕果仅存人物》(周黎庵,第42期)、《孽海花人名索隐表》(冒鹤亭,第51期)等文章又从各个角度加以详述。这些使张爱玲在《杂志》中的年青、时尚形象中又加入了豪门贵族背景,使张爱玲获得了贵族才女的称号。在一个前朝人物聚居的城市,在一个年青且需要加入历史文脉的城市,张爱玲的贵族背景与她的才华相得益彰,互相辉映。

连南京的短命杂志《苦竹》也发表了一些张爱玲的作品《谈音乐》(第1期)、《自己的文章》(第2期)、《桂花蒸 阿小悲秋》(第2期),沈启无的《南来随笔》(第2期)则是研究张爱玲的重要文章。

综上所述,当时的很多期刊都对“张爱玲传奇”的诞生有重要贡献:《紫罗兰》对张爱玲小说处女作郑重推荐;《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张爱玲的作品和绘图,展示了张爱玲多方面的才华,经常邀请张爱玲参与杂志的各项活动,在为她出版《传奇》后还组织专门的评论会。加上《天地》作为一个女性主编的杂志对张爱玲的器重,《万象》的推波助澜,《古今》对张爱玲家族背景的挖掘,《风雨谈》、《苦竹》上发表的对张爱玲评价很高的文章,包括战后创刊的《大家》对张爱玲电影作品的介绍以及褒奖,所有的这些上海期刊一起建构了一位天才、贵族、有最时尚的品味的女性作家形象。这样的女性形象,毫无疑问最符合当时十里洋场对女性的想像,而张爱玲也很智慧地保持了这样的想像,可以说是当时上海的期刊与张爱玲一起创造了“传奇”。

1944年8月15日,张爱玲将自己的小说结集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小说集取名为《传奇》。《传奇》一面世即非常火爆。“张爱玲女士的小说集《传奇》由本社刊行后,不数日而初版销售一空,开出版界之新纪录,张女士作品之为读者所重,于此可见。……《传奇》再版本在印刷中,不日出书。”(“编辑后记”,

《杂志》第13卷第6期,1944年9月10日出版),9月25日《传奇》便再版。12月,张爱玲又将其散文结集为《流言》出版,同时由张爱玲亲自操刀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在上海新光大戏院演出,连演80场。至此,整个上海的目光几乎都投射到张爱玲的身上,上海文坛甚至中国现代文坛的“张爱玲传奇”诞生了!

张爱玲曾这样释题:“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也许正是由自己本不过是一个生于乱世的普通人,却成为了现代社会造就的一个大大的“传奇”生出的感慨。而这个“传奇”的诞生我们只有把它放在上述20世纪40年代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中才能够理解并得到解释:是近现代上海这个特定的“场”,大量的现代期刊的出现,女性作家集体浮出历史地表,现代期刊的“造星”运动,……所有这些因素缺一不可,正是它们的综合所构成的“网络”才使“张爱玲传奇”得到诞生。我们也只有将“传奇”放在张爱玲文学场域中,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时代,文学“传奇”却能够诞生。

注释: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收入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8(1):55页

柯灵.遥寄张爱玲.见.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子通、亦清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8(1):383-384页

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79页,80页,86页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133-134页

关于张爱玲诞生的时间,有1920年与1921年之说,笔者采用的是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先生在其《我的姊姊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一书中的说法。

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1页

杂志.1944(13):5页

吴小如.读张爱玲《传奇》.原载1947年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转引自陈子善先生编.张爱玲的风气.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5

顾乐水(章品镇).《传奇》的印象.原载1944年9月南通.北极.第5卷第1期,转引自陈子善先生编.张爱玲的风气.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5

柯灵.遥寄张爱玲.收入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8(1):384页

朱朴.古今一年.古今.1943(16)

伍尔芙.妇女与小说.转引自.伍尔芙作品精粹.李乃坤选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12:397-400页

李君维.张爱玲的风气.载1947年12月上海.太太万岁上演特刊.转引自陈子善先生编.张爱玲的风气.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5

作者简介:李晓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编辑:豫民